京官名宦与惠州 3

统筹策划/陈骁鹏 马勇

“欲由人道归天道，应使先知觉后知。”明代惠州著名理学教育家杨起元的这两句诗，体现了诗人“自觉觉他”的博大襟怀，也投射出明代惠州师儒们的一道精神亮色。从明代开始，惠州广设儒学初等学校——社学。嘉靖年间，在册人口约12万人的惠州府就拥有48间社学。

不仅教育机构完善，明代惠州师资也很雄厚。粤省六大善教者之一翟宗鲁投身基层儒学教育；高文士叶春芳弃官回乡教书，培养出明代惠州三尚书之一的叶梦熊……来自域外和本地生长的知识精英们热情投身教育，他们崇尚风骨，澹泊名利，献身教育，使乡邦文化薪火承传，学统延绵，明代惠州形成了前辈师儒敬业乐教、后来学者尊师好学的良好士风。

插图/杜卉

社学师儒影响下的乡邦士风：

明代惠州士人 澹泊名利尊师重教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壹 乡村办『社学』启导蒙稚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于马上得天下之后，一再强调教化育才的重要性，洪武二年（1369年）连续两次下诏建立学校。当年归善知县木寅权把丰湖书院改为归善县学，同时着手在惠州府治附近觅地筹建各县儒学。次年，河源县儒学重建；洪武三年，长乐县儒学重建；洪武四年，博罗县和兴宁县儒学重建；洪武八年，惠州府学重建；洪武十三年，海丰县儒学重建……惠州府县两级儒学在明朝初大体建成。

明朝强调大力发展官学，规定只有官学的学生才能参加科举考试，非进士不得进翰林，非翰林不得进内阁。在这一时期，惠州考中进士和举人的士子，几乎都出于府、县学。

此外，明初还继承了元代在乡村办“社学”的教育制度，通过社学在乡村地区启导蒙稚，推行王治教化。据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洪武八年正月，始诏天下立社学。

社学是一种在乡村设立的初等学校，与近代的小学相似，主要对儿童实行启蒙教育。从现存资料看，惠州乡邑大张旗鼓办社学，大概始于嘉靖初年，当时魏校任广东提学副使，崇儒学而斥佛老，惠州城乡各地的寺庙被改建为社学书院。清光绪《惠州府志》载，明嘉靖元年惠州府缴纳赋税的在册人口为123270，而全府社学有48间，社学的人均占有率颇高。

乡村社学开展启蒙教育和文化普及，向州县儒学输送人才。官方体制外的书院讲学这时也重现生机，在教学的制式方法和思想风格上，弥补了儒学的不足。经过一百年的努力，一个推行儒家教化的多层教育机构自上而下编织而成，奠定了明代惠州文化教育的基本格局。

明嘉靖年间惠州府各县社学情况表

县名	数量	社学名称
归善	8	南隅、北隅、西隅、东隅、东关、崇正、上堡、中堡
博罗	12	兴贤、西隅、江东、榕溪、礼村南隅、礼村西隅、罗浮、蓬莱、原冈、清湾、西埔、白沙
海丰	6	北门、河头、城南、龙津、石桥、捷胜
河源	3	东隅、南隅、北隅
龙川	5	兴贤、南隅、龙津、正谊、云衢、龙溪
长乐	8	居仁、由义、立礼、秉智、县前、羊头、小渡、三洑
兴宁	3	富谷、维城、十三都
和平	3	在城、西城、林证
总计	48	

贰 本地士子成教师队伍主体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社学办学质量的高低，社会学习气氛之好坏，师资的优劣是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明代中晚期惠州书院和社学的师资情况与南宋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以客籍师儒为主，像翟宗鲁这样学行优秀而又乐于献身教育的本土士子，已成教师队伍主体。

翟宗鲁，字一贯，泊头（今属博罗九潭）竹阵村人，少补博士弟子，嘉靖十年（1531年）中举，稍后于罗仙都（今博罗龙溪）建寒江精舍，后改名涵江精舍。翟氏善教，被屈大均誉为“吾粤六位善司教者之一”。

翟宗鲁的教学方法很特别：来学者在学校居住十天，若各方面的表现令人满意，叫做“放心”，可进入正堂听课问学；如其间屡犯过错，被称为“有过”，要收置于西面房舍反省悔过。知错能改者称“改过”，可以从西面房舍转到东面房舍。真的改过了，即恢复他升堂听课资格。这样一来，学生无不“尊教惟谨”。

这种方法为时任广东提学副使魏校所赞赏，罗浮社学和涵江书院于是名噪岭东，来学者日众。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翟宗鲁被授为宣平教谕，他就把这套方法推广开来，“先德行，后艺文，士彬彬向风矣”。

翟宗鲁是个品行高尚，“爵禄不撄其心”的教育家。嘉靖十九年（1540年），武定侯郭勋为儿子物色老师，选中了翟宗鲁，开出“月粟二石，岁进百金”的优厚条件聘请他。郭勋为开国功臣郭英的六世孙，出身勋阀，怙宠骄恣。当时阴欲攀附郭氏而苦于营钻无门者大有人在，而翟宗鲁对送上门来的机会却淡然一笑，以家中无子不能远离为由婉拒。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他受聘典蜀试，依常例，受聘者都有一笔额外聘金，当事人袁某对翟宗鲁特别看重，将他的聘金加码。最初，翟宗鲁认为官员取食国家俸禄，额外收受聘金有违规制，屡辞未果，就“用所得聘金建文明书院，并置田以赡学者”。

三年后，翟宗鲁迁知广西融县，因刚毅守志，清廉耿介，终为上官所不容，于是上书乞归，重返涵江精舍讲学，生活清贫而怡然自甘。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病逝于家，挚友庞嵩葬其于博罗龙华之东，门人学者把书院改为祠堂祭祀和纪念他。

叁 世家名儒澹泊名利弃官从教

乡村社学兴盛，给书香世家子弟一条退路，归善县的叶春芳、叶春及弟兄就是典型。叶春及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解元，守法如山，却因遭贵陷害而离职，弃官回乡教书近二十年，育才无数；其堂兄叶春芳更是十五岁就补郡庠生，考试屡得第一。当时的提学副使魏校对他十分器重，将之聘为社学老师，后被贡选福州府古田县当县丞。

叶春芳从政三年，政绩斐然，百姓拥戴。但因疏慢了过往上官而遭呵斥，他随即辞官返乡教书。万历年间曾任兵工二部尚书、太子太保的叶梦熊，正是叶春芳第四子，也是他最优秀的学生。

博罗人曾应旋也是如此。他是御史曾禄的侄儿，性耿介，嗜书。嘉靖四年考中举人，授官漳平县令，上任后与上官一语不合，辄挂冠而去，回乡时囊无长物，只有书籍自随，成为乡中名师。

澹泊名利、养志不仕的人也不少。博罗高士陈宣不远数千里到江西师从名儒罗洪先，学后超然有得，上书放弃博士籍。再如博罗人曾涣，嘉靖十六年（1537年）应乡试，大家都认为他必能高中。入试前夕，他接到从兄曾汉病死的音信，毅然放弃功名返乡帮助料理丧事。

对明代惠州士人的这一特点，郡人张可廷论述“硬直”为广东人特性时指出，此种特性，一由环境造成，一由师儒培养。社学师儒是明代惠州教育的底层基石，他们大都以节义相尚，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甘为升斗布衣隐身里中，食贫自怡，教书为乐，被视为一方人格楷模，无形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学生后辈乃至四乡百姓的生活态度和道德取向。

文史杂谈

一代雄主朱元璋，为何那么重视教育？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从草根平民到开国皇帝，大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创造了人生传奇。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位布衣天子非常重视教育。还在政权初定之时，洪武二年，他就连续两次下诏全国建立学校；洪武八年正月，他又明令天下立“社学”，推进乡村官学建设。

一代雄主朱元璋，为何如此重视教育？

总的来说，这是为了推行王治教化，选拔更多人才。不过这与宋代刚立国时主要靠民间办学相比，明王朝力推官办确实更显出对教育的特殊重视。

朱元璋对推行民众教育如此上心，正与他的经历有关。

朱元璋出身低微，祖上几代人都是佃农，因为家贫，他只读过几个月私塾，便辍学给地主放牛。15岁那年，他的家乡遭天灾和瘟疫，转瞬家破人亡。为活下去，他进皇觉寺做和尚，不久寺院也缺粮，他成了游方僧，沦落成了叫花子。

这样的经历，使得朱元璋对底层民众的贫困有切肤之痛。因此他掌权后力推官办学校建设，让寒门子弟有书读。

朱元璋为生活所迫投军后，他对知识力量和文化价值有了更多的认识。

在军中，朱元璋凭着聪明、见识、能力和上进心，在郭子兴麾下一步步成为将领。在定远，他靠着徐达、汤和等拉起了属于自己的队伍。

从为吃饭发愁的叫花子到手握3万兵马的抗元将领，这时的朱元璋已算是个成功者。但与他后来的巨大成功相比还差得远。当然，那时的他，也远没做好成为一代雄主的思想准备。

这时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朱元璋。他就是后来被列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的李善长。

定远人李善长，当时就是一介儒生。然而他们初见时的一番对话，彻底点亮了朱元璋的人生。

见来的是个读书人，朱元璋若有所思地问：“四方战斗，何时定乎？”

李善长给朱元璋讲起刘邦的故事：秦末四方并起，汉高祖出身平民，然而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图眼前富贵享乐，不烧杀抢掠，五年就成就了帝王大业。如今朝廷不得人心，上下失和，天下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主公只要仿效汉高祖的所作所为，天下很快就会平定。

我们如今无法知道，听到这些话时的朱元璋心绪是怎样的波涛汹涌。但这段话足以让他惊愕，让他豁然开朗：原来人生可以这样过！

李善长不仅为他立了志向，树了榜样，还为他指了道路，且连实现路径都有了！

朱元璋的宏图霸业终于即将展开，而李善长正是这张宏图的总规划师。

此后多年，朱元璋都在为此努力。他招揽人才、拓展实力，并严格治军、收服民心。最终他在与刘福通、陈友谅、张士诚等的逐鹿中脱颖而出，并击败元朝，成了最后赢家！

或许就是在李善长身上，朱元璋第一次看到了学识的力量。他虔诚地说：如今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如果没有像先生这样智谋的人，是不行的。

史书记载，此次谈话后，朱元璋留李善长做幕府掌书记，成了他的智囊、军师和大总管。

李善长也让朱元璋认识到，一个人能力有限，要想成就大业，需要招揽人才为己所用；事业越大，所需人才越多。

战争年代揽才不易，建立政权后天下人才皆可为己所用。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启用学校与科举制度来培养、选拔人才。明王朝很快建立起了远比唐宋时代更完备的教育制度。

另外，朱元璋重视儒学教育，还有个时代因素。南宋汉族政权亡于元朝蒙古政权，传统汉族正统观念在民间一直存在，反元斗争中肯定不会浪费了这一舆论利器。朱元璋在讨元檄文中使用的口号就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力推儒学教育，不仅是讨元战争的客观需求，朱元璋本人也有儒学文化的情结。出身卑微的他曾自称是宋代大儒朱熹的后代，内心对儒学文化自有一些亲近感。因此一立国，他就力推官办教育的恢复和重建，用儒家文化教育和选拔人才；而终其一生，他也一直在竭力推动汉儒文化的发展。

文脉故事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八品县丞身后被追赠“太子太保”

叶梦熊是惠州“明代三尚书”之一，老惠州人几乎无人不知。然而很少人知道，他的父亲叶春芳是远近闻名的文人，曾因疏慢上官毅然弃官，回家教育后代。叶梦熊成为太子太保后，只当过八品县丞的叶春芳也被追赠为太子太保。

叶梦熊三代内均有封典

叶梦熊，明代惠州府城万石坊（今属惠城区）人。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进士，文官出身，却因领兵平叛有功，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赠太子少保，太子太保，升兵部尚书，转南京工部尚书。

叶梦熊功成名就后，五次称病请辞获归，在惠州建回龙寺，其妻廖氏出资助建三台塔（即文星塔）。叶梦熊回到家乡教导晚辈读书，两年后去世。

惠州市博物馆原馆长王宏宇介绍，封建社会统治者为显示恩威笼络官员，创造了一套封典制度，给官员本身及其妻室、父母和祖先以相应的荣典。叶梦熊最后官位为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其品位为一品，按一品封三代制度，叶梦熊的祖父母、父母亲均有封典。

叶梦熊的父亲叶春芳，生前担任的最高官职为古田县丞，正八品。身后却因儿子追赠太子太保，崇祀乡贤祠，得到了一品的封典。叶梦熊的母亲也成为一品夫人。

建议修复犹龙山墓园

据史载，叶梦熊受父亲影响，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临终之日还召子女以教诲，饭后仍阅案头书，忽然间呼唤子女到身边，说了句“乃翁长往矣”便过世了。

叶梦熊去世以后，一直赏识他的万历皇帝悲痛万分，将他赐葬于菱湖畔的犹龙山。惠州同乡、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杨起元为叶梦熊作墓表，以“圣贤”称之。墓上石碑为“葵心体国”和“忠义可嘉”二面。

据介绍，自明代起，叶墓就成了惠州最有影响的古迹之一，历代吟咏甚多，连犹龙山也因而得名“太保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叶墓地表部分被毁严重，但地下部分墓室仍在。王宏宇确认，目前仍有2/3墓室被封存于惠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扩建的职工楼后。

“太可惜了！这样一座规格高、有丰富历史信息的古墓，地表建筑彻底被毁，这是惠州历史文化资源的巨大损失。”惠州市博物馆退休文物专家郑成文如是感慨。

叶梦熊墓处于西湖风景区范围内。王宏宇建议，可结合惠州西湖风景区的规划建设修复叶梦熊墓地：“建议相关部门尽快推进墓园的修复建设。”

文脉观察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明代惠州儒家教育呈家族化趋势

三尚书、四御史、湖上五先生……明代惠州优秀人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且呈现出家族化、家法化趋势。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惠州文史专家何志成介绍，这是惠州士大夫家庭教育大发展的结果，“已成为明代惠州发展教育、延续学统，传递文化精神的重要一环”。

作为官办社学的补充，明代惠州还出现了由私人兴办的宗族性义学和义塾。惠州兴办宗族性义学，最早的当数何真。

何真于洪武三年（1370年）举广东之籍归顺明朝，受到朱元璋的接见和嘉奖，被任命为山东布政使，自此举家迁离惠州。何真离惠后，对留惠族人的生活和教育仍很关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为义祠，并所有私田百余顷为义田”。

不仅如此，何真还请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写下《惠州何氏先祠碑》，述记其置义田办义学的始末和宗旨，刻石立碑，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遵行不废。

明成化六年（1470年），工部右侍郎李颙在博罗县城兴仁巷建义塾，延师以训族里子弟，是博罗县最早出现的宗族私塾。此后，惠州士大夫家庭教育风气渐成，并出现家族化、家法化的倾向，“以家规或族规约束本家、本族子弟用心向学和考取功名，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

嘉靖、万历年间惠州出现了“三尚书、四御史”以及“湖上五先生”等等，这些优秀人物在仕途和事业上的成功，无不与其严格的家庭教育有关。惠州文化学术空前繁盛，人才不断涌现，除叶春芳的弟弟叶春及、儿子叶梦熊，李鹏举的儿子李学一，杨传芳的儿子杨起元外，还有“惠江先生”叶时的儿子叶萼等。

何志成说，这几位名门后辈，打破了“贵游子弟，多无学术”的定律，各自渊源家学，青出于蓝，立身行道，以德业扬名于后世。他们被邑人尊称为惠州“湖上五先生”，在西新园建五贤祠供人祭祀瞻仰，显示了家乡百姓对他们文化成就的敬重和人格力量的认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士大夫家庭教育的优秀成果。父辈对“湖上五先生”的教育，可谓惠州家庭教育的典范。何志成表示：“士大夫的家庭教育已成为明代惠州发展教育、延续学统，传递文化精神的重要一环。”